



7名战士坚守阵地 他用这把军号吓退敌军



郑起在抗美援朝战场吹响冲锋号。(资料图)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把军号。它长33厘米、宽10厘米，金色号身上布满了绿色的铜锈。看似普通的军号，为何会被列为馆藏一级文物？因为它是决战时刻冲锋陷阵的精神指引，更是生死关头转危为安的制胜法宝。

这把军号的主人是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郑起。1946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司号员。

1951年1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釜谷里战斗中，郑起所在的志愿军374团第7连奉命夺取和守卫釜谷里南山阵地。战斗打响后不久，7连就遭到严重伤亡。占据高地的敌人用密集火力压制志愿军的进攻，英勇的战士们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终于拿下了南山阵地。

为夺回阵地，敌军在坦克和炮火支援下发起冲击。由于敌人攻势太过猛

烈，导致无法修筑工事和掩体，7连官兵就趴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战斗。连长厉风堂、副连长王凤江、指导员张鼎和排长们接连牺牲，厉风堂用尽最后气力把压在身下的驳壳枪掏出来交给了郑起，把指挥权给了这个当时不到20岁的小战士。

拿着连长交给自己的驳壳枪，郑起满怀怒火和力量大声喊：“全连同志，听我指挥，守住阵地，打退敌人！”他火速召集全连6名党员，将剩余的十几名战士分为三组死守阵地。

1月3日下午，敌人发起第七次冲锋。数千发炮弹雨点般倾泻到阵地上，8辆坦克被全部派上。因为他们清楚，只有攻下南山阵地，才能跳出志愿军的包围。

50米、40米、30米，等到能看清敌人钢盔时，郑起才下令开火。刹那间，敌人纷纷倒下。可更多的敌人沿着土坎后边爬了上来，越来越近。激战到下午5时，有的敌人已冲到距离阵地不到20米的地方。战士杨占山、爆破手史洪祥拉开爆破筒投向敌人。至此，7连的弹药已经全部打光。战士们端起了刺刀，目光如炬，迎着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嘀嘀嗒，嘀嘀嗒……”危急时刻，身负重伤的郑起碰到随身携带的军号。他立即取下，猛然站立起来，用尽全身力气吹响了冲锋号，吹到嘴唇出血也未停下。嘹亮的号声震荡在阵地上空，嘹亮的冲锋号响起在阵地上空，蜂拥而上的敌人愣住了，仓促间摸不清虚实，以为志愿军大部队到了，吓得逃回了山下。不久后，阵地上空升起了红色信号弹。“我们的



郑起的军号。(图片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大部队来了！”郑起和其余6名战士激动地欢呼起来。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7连战士坚守阵地，先后击退敌方营、连级规模的7次进攻，为全团部队成功发起总攻争取了宝贵时间。7连由此获得“钢七连”的荣誉称号，全军闻名。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郑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记特等功一次。

“联合国军”司令官李奇微曾这样形容志愿军的军号：一种铜制的乐器，能够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在战场上，只要它一响起，志愿军就像着了魔法一般，全部不要命地向“联合国军”扑来。的确，当冲锋号声在战场上响起，志愿军官兵就会不怕一切牺牲、不顾一切困难，坚决完成战斗任务。视号令重于生命的志愿军，让敌人胆寒。谈起当年的事迹，郑起总会说：“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志愿军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震慑住了敌人。”（据央视新闻、中国军网）

甘祖昌：“将军农民”的本色

1986年3月28日，江西省莲花县的一位“农民”因病去世，享年81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交代家人：“领了工资，先交党费，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家中有一个他珍藏多年的铁盒子，里面用红布包裹着三枚勋章，这是他的全部遗产。他一生富于传奇色彩——早年投身革命洪流，跟随主力红军长征，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但他依然保持一位红军老战士艰苦奋斗的本色，淡泊名利。后来他辞去军职回乡务农，造福一方百姓。从农民到将军，他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出生入死、多次负伤，戎马生涯29年，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之后从将军当农民，恰好也是29年，对他而言是心灵的回归，也为后人树立起一座精神的丰碑。

他就被称为“将军农民”的甘祖昌。1951年初，在新疆军区后勤部工作的甘祖昌下部队。路过一座30多

米长的木桥时，因敌特分子蓄意破坏，提前锯断了桥板，导致他连人带车掉进河里，身负重伤。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虽然没有生命危险，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他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回家就跟妻子龚全珍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多次向组织写报告辞职：“我自1951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贡献。”1957年，甘祖昌终获批准，辞去了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职务。

选择做一个农民，甘祖昌不是为了享受田园生活，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离开新疆前，他对家人说：“从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

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全家老少十几口人，行李精减再精减，只装了3个箱子、3个麻袋，动物笼子却带了8个，里面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航鸡。来给他送行的王震将军不禁一乐：“老甘，这是你们搬家还是动物搬家？”他带这些动物，当然不是为了自己改善生活，而是想把新疆的优良品种，带到江西推广养殖，造福乡里。回到家乡后，甘祖昌和两个弟弟挤在一起，3家人同住一套老旧小楼。组织上提出要为他修建一处单独的住所，也被他婉言谢绝。他常说：“我是回来种田的，不是来当官做老爷的。”江西省有关部门准备为他配一辆小轿车，他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我参加实际工作不多，根本没有配小车的必要，还是给国家节约一点经费，用在更需要的部门吧。”

“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这是甘祖昌对自己提出的

要求。在江西，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家乡的建设，一直坚持参加劳动，和乡亲们一起改造红壤田，修起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为促进家乡的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甘祖昌生活节俭，一件衣服一穿就是10年，常常补了再补，实在是不能补了就拿去做鞋底。但他也很慷慨，拿出工资支援家乡建设、扶贫救危。1957年至1984年间，甘祖昌工资收入原有存款共计10万余元，有统计的捐款约8万元。他说得最多的是：“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

一个人用一生践行初心使命，必然会成为天地间的崇高之美，如山岳之壮丽、如星河之璀璨，被永久铭记、仰望。甘祖昌，这位老党员、老红军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传奇故事，不是讲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世代传承赓续！（据《解放军报》）

鲁迅的喝茶人生

与其品茗的经历，边喝茶边聊天，无非是闲谈、叙旧、约稿、交换对时事的看法等。

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外出喝茶的次数并不很多，但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则较频繁。在广州的8个多月里，有记载的喝茶就有13次以上。鲁迅曾到大观园、大新公司、拱北楼、山泉、在山茶店等处喝茶，其中陆园是鲁迅去得最多的地方。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定居后，外出喝茶的频率明显减少了。在上海的9年多时间里，有记载的喝茶仅9次。鲁迅前往茶店或者咖啡店喝茶，多半是有事，而不是纯粹的休闲。这时候鲁迅和许广平已经组织了自己的家庭，更多时间是在家里喝茶。鲁迅平时喜欢在晚上写作，开始写作前，先泡上一壶茶，在书桌旁边的藤椅上躺一会，闭目养神，打打腹稿，然后再动笔。到冬天时为了防止夜深茶凉，许广平特意缝制了一个棉花壶套，夜里套在茶壶上，这样茶就可以保温。鲁迅喝茶有自己的特点，他喜欢大口大口地喝，茶要浓，口感要重。他追求喝茶的自然朴实，排斥把喝茶作为品质生活的装腔作势。因此，他不喜欢细斟慢饮的功夫茶，拒绝慢悠悠的鉴赏。

在家里喝茶，就不免要自备茶叶。在茶叶方面，鲁迅对杭州的龙井多有偏爱，也喜欢普洱。早年在北京时，他常去稻香村买茶叶，也到鼎香村等处

买，每斤价格基本在1元左右。从他买茶的频率看，他每月喝茶约1斤。晚年在上海时，买茶叶已经不是1斤2斤地买，而是更多。有时自己买，有时委托他人代买。据鲁迅日记记载，1931年5月14日，“以泉五元买上虞新茶六斤”，紧接着第二天又“买上虞新茶七斤，七元”，两天时间就买了13斤茶叶。这还不算多。1933年5月24日，“三弟及蕴如来，并为代买新茶三十斤，共泉四十元”。一次就买了30斤茶叶，而且价格还不便宜。

鲁迅之所以要买这么多茶叶，不是为了做生意，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喝，而是送人，如内山完造、周建人等人，其中送给内山完造的许多茶叶是用作施茶用的。当时，内山完造在上海内山书店的门口设立了一个施茶桶，向路人免费供应茶水，需要大量茶叶，鲁迅是这项活动的支持者和赞助者，所以买了许多茶叶赠送给内山完造。

从早年开始，亲友就常常赠送或寄赠茶叶给鲁迅。早期经常送茶叶的是宋琳，他是鲁迅的老乡，又是学生，后与鲁迅同事，感情深厚。后来，其他人如学生加同事李仲侃、亲密弟子许钦文、女作家葛琴、老朋友林语堂、未名社弟子台静农、厦门大学同事毛瑞章、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等都曾给鲁迅赠送过茶叶。所以，鲁迅的嗜茶在朋友圈中是尽人皆知。

（据《联谊报》）

李敷仁：办报救国 宣传革命

“知尔杀人数不清，焉知民力大无穷。一滴鲜血一坯土，杜鹃血染麦浪红。”这是著名新闻与教育工作者李敷仁在被反动派特务枪击受伤后写下的诗句，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的丑恶罪行。

李敷仁，祖籍陕西蒲城县，1899年生于陕西咸阳北杜镇。1920年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1925年毕业后在陕军何经纬部教导队任文化教员。

1928年后，曾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助理干事、科长、党部机关报《中山日报》编辑，发表《帝国主义进了潼关》等社论，又在《觉悟青年》发表《地皮将透的咸阳》，揭露军阀、土豪、贪官污吏的罪行。

1931年赴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愤然回国，先后在凤翔二中、兴国中学等学校任职。

1937年，李敷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在西安创办《老百姓报》。《老百姓报》办报4年，总发行量达到100多万份，有万名左右的订户，影响颇大。但因旗帜鲜明地抨击国民党当局，《老百姓报》被迫停刊。1942年，李敷仁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西北民盟总支部青年部主任。1945年5月，李敷仁创办《民众导报》，任主编兼主笔，提倡民主，反对独裁，宣传革命。

1946年5月1日，李敷仁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特务向李敷仁连开两枪，所幸李敷仁并未死亡，被当地群众救回家中。次日，在得知李敷仁生还的消息后，特务又去搜查，李敷仁经群众多方掩护未被发现。

5月3日，中共陕西省工委获悉情况后，立即开展营救。李敷仁先后被安全转移七八处地方，终于逃出虎口，颈部的子弹也被取了出来，并于7月17日抵达延安。

1946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李敷仁历任民盟中央委员、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西安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等。李敷仁因枪伤严重导致长期身体衰弱，于1958年2月19日在西安病逝，终年58岁。

（据《人民日报》）

陈独秀谈鲁迅

一次，陈独秀和他的表弟濮清泉谈起鲁迅。

陈独秀说，首先必须承认，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中短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达各方面，都超上乘，比其他作家要深刻得多，因而也沉重得多。不过，就我浅薄的看法，比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中国古典作家来，似觉还有一段距离。《新青年》上，他是一名战将，但不是主将；我们欢迎他写稿，也欢迎他的二弟周建人写稿，历史事实，就是如此。现在有人说他是《新青年》的主将，其余人是喽啰，渺不足道。言论自由，我极端赞成，不过对一个人的过誉或过毁，都不是忠于历史的态度。

陈独秀入狱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他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屎的下场）。濮清泉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他焦大，他就贬低鲁迅呢？

陈独秀说，我绝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挨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绝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谩骂绝不是战斗，我很佩服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为他为良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愧之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不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这个期待不会落空。

陈独秀对鲁迅的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发自内心的。（据《人民政协报》）

张友鸾巧拟新闻标题

张友鸾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报纸编辑，早年担任南京《新民报》总编辑时，就以善于编写新闻标题而著称报界，即使一则简单的气象短讯，标题一经他加工处理，往往别有趣味。有一年，南京连日阴雨，张友鸾听完气象预报，挥笔写下“潇潇雨，犹未歇，说不定，落一月”的标题，雅俗兼顾，朗朗上口，化平淡为神奇，让人过目难忘。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抗日呼声此起彼伏。张友鸾为一篇新闻报道拟定了一个标题“国府门前钟声鸣，声声请出兵”，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表达了一个报人炽热的爱国情怀。一次，某社会机构为前线士兵发起募集冬衣活动，张友鸾在刊发这条新闻时，借用元曲小令配制了一条标题“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为征募活动发挥了力所能及的宣传作用。

抗战爆发后，《新民报》迁往重庆，张友鸾出任主笔、经理，披挂上阵，主编社会新闻。彼时，前方军民浴血抗战，后方达官巨贾却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新民报》在刊发一则揭露国民党官员生活奢靡的消息时，张友鸾写下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标题。“吃紧”反映前方战事残酷激烈，“紧吃”揭示后方权贵醉生梦死，构思奇巧，别出心裁，读者无不拍案称绝。

（据《联谊报》）

陶行知：循序渐进培养孩子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对他的孩子们，从小就重视要动手劳动，不要做少爷、小姐，养成做人上的毛病。他外出不在家写信时还要在信上叮嘱他的长子陶宏、次子陶晓光：“桃红、小桃在家，自己的事要自己干。衣服要学洗，破了要学缝。烧菜弄饭都要学。还要扫地抹桌。有益的事都要做。”

及长一些，陶行知就要求孩子们向自助助人的方向去做。陶行知觉得社会上对小孩的教育普遍只有两个阶段：一是全然依赖；二是忽然自立。这中间缺少明确新进的桥梁。他在“儿子教学做之四个阶段”的诗里这样写道：

三餐喂得饱，个个喊宝宝。小事认真干，零用自己赚。全部衣食住，不靠别人助。自活有余力，帮助别人立。陶晓光13岁时，陶行知就教他一面自学，一面写稿子投稿；一面学英文，一面编译小的科普文章，这都可以赚些零用钱。（据《天津日报》）

一封掩埋30余年的密写信

平津战役纪念馆中陈列着一份乍看并不起眼的草纸。纸张呈黄褐色，边缘残破。这是一封掩埋地下30余年的密写信，它正为我们讲述着一段传奇般的真实历史故事……

1948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抑留并歼灭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的作战方针。

为贯彻执行军委决策，中共冀东区委天津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选派林朝打入塘沽，吕朗则是我党的地下交通员，负责向天津市内地下党传达消息。组织上特许林朝和吕朗之间进行横向联系，担负塘沽与工委之间的情报传递。

11月下旬，吕朗带来工委的指示，要求积极搜集敌军兵力、防守部署等情报和提供地图，为解放塘沽做准备。

12月，林朝将短短十几天时间搜集到的全部情报汇报给了吕朗。吕朗用米汤将内容写在草纸上，这种用特殊方式书写的信件即为密写信。晾干后纸上没有任何字迹，阅读时只需用碘酒擦拭草纸，字迹即可清晰地跃然纸上。

吕朗迅速地将密写信送往工委机关。当到达工委驻地小芦庄村时，因敌情紧急，工委已临时转移。吕朗发现有敌人巡查，急中生智用多层油纸把密写信包裹好，深埋于村里一个居民院内，匆匆离开。幸好他及时与工委接上头，将信中内容口头汇报给工委。

时光荏苒，20世纪80年代，原地下党员再度聚首塘沽，追忆往事，回想起当年埋在小芦庄村的密写信。经挖掘，密写信重见天日。这封保存下来的密写信，是我党地下党员艰苦卓绝斗争的直接物证。（据《解放军报》）